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Ralf Emmers		
<i>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i>	楊 昊	01
Philip Robin		
<i>Suits and Uniforms-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i>	許 文 妍	05
Richard Haass		
<i>The Opportunity : America's Moment to Alter History's Course</i>	簡 嘉 宏	10
伊多·奧倫(Ido Oren)著 唐小松、王義桅譯		
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和美國政治學的形成	郭 銘 傑	16
Wolfgang Reinicke		
<i>Global Public Policy: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i>	施 偉 仁	19
杭廷頓，柏格/編 王柏鴻譯		
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	謝 叔 芳	22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〇六年三月
第九期



資深編輯顧問	石之瑜、江瑞祥、蘇彩足
編輯顧問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主 編	李靜旻
編輯委員	李豫宜、吳昀展、莊文一、曹維倫、黃國鈞 潘惠伶、蕭仔君、蕭育和、蘇軍璋
校外編輯委員	江妍儀、廖斌洲
發行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

楊 昊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亞太區域近十餘年來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對話與合作機制，這些機制適當地提供了討論與管理區域事務的重要制度平台，同時也為亞太地區帶來了更為多元的合作契機。儘管如此，研究者若囿於這日漸興盛的區域合作風潮，因而過度天真地期待亞太地區正朝向歐洲統合的理想型進程邁進，則將可能輕忽亞太國際政治中既存已久的權力競逐邏輯與強權緊張關係，從而無法清晰掌握亞太安全事務之完整系絡。從過去的研究文獻中，不難發現有關亞太地區的安全情勢發展大致具有兩個主要的運作邏輯，其一為晚近興起之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透過制度設計所推動的合作邏輯，其二則是長期以往隱含於亞太國際權力結構中的權力平衡因素。就二者之學理系絡而論，合作安全係源自於新自由主義或所謂的自由制度主義的立論基礎，而權力平衡因素則繫於現實主義系譜之論述。這兩個不同學派的觀點正提供了目前研究亞太安全議題的學者間所隱約形成的二分（dichotomy）知識論體系。事實上，從事亞太安全研究的新一代年輕學者 Ralf Emmers 所撰寫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 一書，即嘗試在學理與概念上處理上述兩個重要概念以至於學理立論間的關係，並在經驗上透過東協（ASEAN）與東協區域論壇（ARF）發展給予相關論述適當之佐證。

Emmers 在本書中援引了相當豐富的一手資料，



書名：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

作者：Ralf Emmers

出版者：Routledge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3

頁數：208 pages

ISBN: 0415309921

其中包括了與東南亞數國重要政府官員、各國大使與外交部長、以及各重要智庫之學者的訪談記錄，使得其在論證文中所主張之概念互補模式（complementary way）上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依據。在論述上，除了前言與結語，本書主要分為六章：首先，第一章開門見山地由制度層面切入探討亞太地區的合作安全建制（regimes），並進而設定本書之研究範圍（pp. 10-39）。作者嘗試從歷史層面來分析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緣起及制度演進歷程，其中涉及了東協模式（ASEAN Way）的討論以及東協作為合作安全建制的主要貢獻與限制。Emmers 指出東協的主要貢獻在於避免衝突與衝突管理（p. 27），然而在較為敏感且關鍵的議題上成員國無法運用東協的爭端解決機制（如 the high council）來解決爭議，則是東協組織長期以來較為人批評之處。直到後冷戰時期的今日，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始見微妙變化，特別是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則提供了亞太地區另一個合作安全建制，同時亦為既有的合作安全建制帶入了更多區域權力動態之變數。上述的發展歷程，正初步勾勒出本書所要探討的題旨與欲涵蓋的主要範圍。

本書的第二章開始從權力平衡的角度進行亞太合作安全建制所處的系絡分析（pp. 40-60）。首先，Emmers 回顧了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的發展與實踐（pp. 40-45），同時探討了亞太地區之權力平衡政治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現況，並進一步分析自 1967 年成立以來的東協作為合作安全建制中之種種權力平衡因素。事實上，本章的重點即在從歷史演進中揭示出東協制度演進所處的權力結構以及以權力平衡為基礎的分析模式，實為研究合作安全建制所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接著在第三章中，Emmers 探討了東協自 1967 年成立至 1975 年間的制度發展，並探討 1984 年東協擴大（納入汶萊）的歷程。事實上，汶萊之所以加入東協的關鍵乃基於區域內的權力平衡以及合作安全考量；Emmers 指出，東協曾確保區域內的強國（如馬來西亞及印尼）將在東協體制內被有效約制，從而不會威脅到在領土、國力等客觀條件均多受限制的汶萊（p. 80）。換言之，東協新一波囊括汶萊會籍的擴大歷程正清楚揭示了當時東南亞區域內對區域霸權的排斥，從而形成了一種以制度約制權力平衡發展的區域體系（pp. 61-84）。除了探討區域內部的權力平衡政治發展外，本書第四章續以權力平衡之觀點來探討東協與區域外強權的關係。Emmers 以第三次中印衝突（1978-1991）為例，指出在 1970 年代末期，泰國為了要抗衡越南入侵東普寨並且企圖在東南亞稱霸的影響勢力，亟需地緣上的盟友來馳援；而東協及其成員無論透過制度所凝聚的合作勢力，或在權力分佈結構中拉近與中國的距離，旋即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平衡勢力。事實誠如 Emmers 所言，

傳統權力平衡的運作確實會受到區域內相互合作之影響 (pp. 85-109)。上述第三、第四章大致陳述了冷戰前的東協的制度演進，並進一步探討東協與東協國家如何處理東南亞區域內部的衝突，以及與區域外勢力（早期的越南、中國等）間的權力互動過程。

到了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安全的發展開始了另一波的變革。Emmers 從第五章開始探討於後冷戰時期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之發展，並將焦點置於該論壇內的權力平衡動態 (pp. 110-127)。事實上，東協區域論壇實為東協欲將其合作安全機制擴大到東亞或亞太地區的制度產物。當然，在論壇建立與運作過程中定將涉及美國在東亞區域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國崛起後與日本等國所進行的區域權力競逐情勢，從而使得制度發展更顯複雜。而 Emmers 透過對此種複雜之權力分佈與制度設計的分析，進一步體現合作安全與權力平衡因素在東南亞區域安全中之共存與互補樣貌。除了東協區域論壇外，存在已久的南海主權爭議更是東協國家與區域外強權（中國）在東協區域論壇中所實質面對的敏感問題，而這即為本書第六章所處理的主題 (pp. 128-152)。Emmers 認為在東協國家與中國處理南海爭議上，因為無法尊重 1992 年的南海宣言，使得兩造在爭端解決上並無法建立具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 (code)，同時亦間接造成了爭議處理制度的失靈。事實上，南海問題同時揭示了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崛起後

所存在的分歧態度，在沒有一套共享的原則與共同的威脅認知前提下，Emmers 指出南海問題的發展將有可能損及東協內部的一致立場，並且也會危及東協本身對於維繫區域安全的集體努力 (p. 152)。

整體而言，由 Ralf Emmers 所撰之博士論文改編出版的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 一書可以視為一部深度探究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如何處理區域安全事務的重要著作。Emmers 全書的論述精神相當清晰——即透過對傳統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二分之解釋邏輯的質疑，進而提出一套「有效的」整合式分析觀點，強調合作安全與權力平衡將以互補的方式共存於制度發展中。綜覽全書，Emmers 從新自由主義的視角描繪出其對東協制度緣起與演進的相關分析，並進一步以現實主義之邏輯探討此一安全安排 (security arrangement) 內、外的權力平衡因素，藉以揭示東協與後續安全安排的種種貢獻與侷限。誠如前文所述，本書的主要貢獻除了嘗試將合作安全（強調新自由主義學派）與權力平衡（強調現實主義學派）等傳統上二分的學理觀點進行概念上的聯結，同時亦透過詳實的訪談記錄與第一手資料展現出作者對該區域系絡與安全情勢的清晰理解與掌握。換言之，本書所蒐集的寶貴經驗資料實可強化讀者對於晚近東南亞安全事務以及東協在初期制度發展上的種種知識。

儘管如此，東南亞安全的發展在

911 事件後有了截然不同的風貌，礙於本書出版年限，很可惜地有不少晚近出現的重要議題均尚未收入，例如，不少與傳統國家或軍事安全相異的議題逐漸成為東協國家晚近所關切的焦點，諸如目前亞洲國家所關切的金融與貨幣安全、麻六甲海域的海盜與海事安全、以及亞太地區的反恐問題等，特別是反恐議題的發展關乎東協如何面對新時代的非傳統威脅與挑戰；¹另外，本書第六章所探討的南海爭議問題之相關文獻也只限於2002年前，而在2002年底以及其後所發展的南海行為準則以及共同開發南海資源之合作趨勢亦尚未囊括在本書論述中。更重要的是，在探討東協制度如何處理區域安全的演化歷程裡，特別是在2003年藉由「巴里第二宣言」(Bali Concord II)所揭櫫的東協安全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以及後續合作安全建制之發展亦屬關鍵；有關這個部份，讀者仍無法在本書中尋得相關資料與說明，期待 Emmers 將本書再版之際能收錄新一波的演進趨勢。

¹ 筆者曾在2006年1月初曾至新加坡訪問 Ralf Emmers 教授，目前 Emmers 將研究重點置於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議題上，其中特別關注東南亞區域內的反恐合作。在訪談過程中，Emmers 指出東南亞地區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恐怖主義，著實地成為加速推動東協安全體的重要推力(driving force)。

Philip Robin

Suits and Uniforms-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許文妍 / 中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一、土耳其重要之地緣戰略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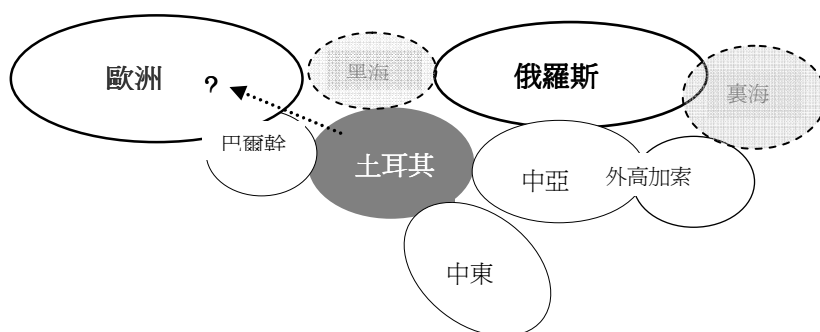
當國人提及「土耳其」時，對其地緣位置可能相當陌生，甚而可能忽略了該國地緣戰略位置之重要性。理論上，根據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論」與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理斯辛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地緣政治面之分析論述皆強調歐亞陸塊之重要性，土耳其則位於歐亞大陸之樞紐位置，於海路方面得以控制黑海區域及黑海進出地中海之通路，陸路方面則可制衡俄羅斯於外高加索之影響力。實踐上，土耳其自冷戰時期以來即為西方陣營對抗蘇聯共產勢力的重要盟友，並於1952年加入北約安全組織，由此可略為描繪出土耳其地緣戰略面之重要性。尤其於冷戰結束後，使土耳其對外關係脈絡有所演化，該國由傳統關注於圍堵共產勢力之外交脈絡，於後冷戰時期逐漸浮現其「多區域間」的樞紐角色。（關於土耳其之地緣位置，請參見圖一）土耳其不僅強化與區域間主要權力之繫—如美國、歐洲、北約與俄羅斯等；同時亦處理與中亞/外高加索區域之能源政治、以及與中東、巴爾幹區域的關係。一方面使土耳其擁有異常複雜的外交政策考量，另一方面，土耳其本身價值亦由於周圍區域之政治、戰略資源重要性而提升。

二、土耳其於後冷戰時期之外交政策

由於後冷戰時期土耳其的地緣戰略位置焦點逐漸發展為區域間之樞紐角色，使得90年代中有關



書名：Suits and Uniforms-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作者：Philip Robins
出版者：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3年
頁數：352 pages
ISBN: 0295982810



圖一、土耳其與各重要區域之地緣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土耳其與歐盟（會員資格）、北約間關係探討，以及土耳其與周邊區域之政治聯繫如巴爾幹、中亞與外高加索、中東區域等間關係探討的文獻漸豐，不過學者 Philip Robin 卻發現，即便由 90 年代至今累積許多與土耳其外交脈絡的相關研究探討，但仍少見國際關係學者正視土耳其問題，因此 Robin 嘗試藉其著作 *Suits and Uniforms-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促使西方學者正視土耳其於國際脈絡中所扮演之關鍵角色，更期盼就土耳其外交脈絡進行整體且全面性之探討。

Philip Robin 為牛津大學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含中東區域政治與土耳其相關研究，Robin 於 1987 年進行中東區域兩伊戰爭（Iran-Iraq War）研究之同時，由於許多相關文獻探討皆與土耳其有直接聯繫，因此興起對土耳其與中東區域之研究興趣。而 *Suits and Uniforms* 一書更集結了作者自 90 年代初期以來針對土耳其研究之精華，主要針對土耳其外交政策脈絡與挑戰進行縝密的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Robin 則嘗試以整體面向探討土耳其於後冷戰時期之外交政策。由於絕大部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研究焦注於該國的對外雙邊或區域關係，因而缺乏完整性。例如由 Tareq Ismael 與 Mustafa Aydin 所編著之土耳其外交政策一書，¹ 即為傳統研究途徑之代表，其觀點聚焦於探討土耳其與西方、土耳其與地理接近區域（俄羅斯、中亞/外高加索、阿拉伯國家、中東）間的聯繫，以及土耳其與主要國家間的雙邊聯繫。Robin 表示於其著作 *Turkey and Middle East*² 亦存有同樣缺陷，因此為了使本書更為完整，作者採用學者 Thomas Risse-Kappen 之相互作用途徑（interactive approaches），整合外交政策的外在及內在因素，以提供更完整且豐富之外交政策分析架構。

故本書主要分為三部分之研究途

¹ Tareq Y. Ismael and Mustafa Aydi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Aldershot: Ashgate).

²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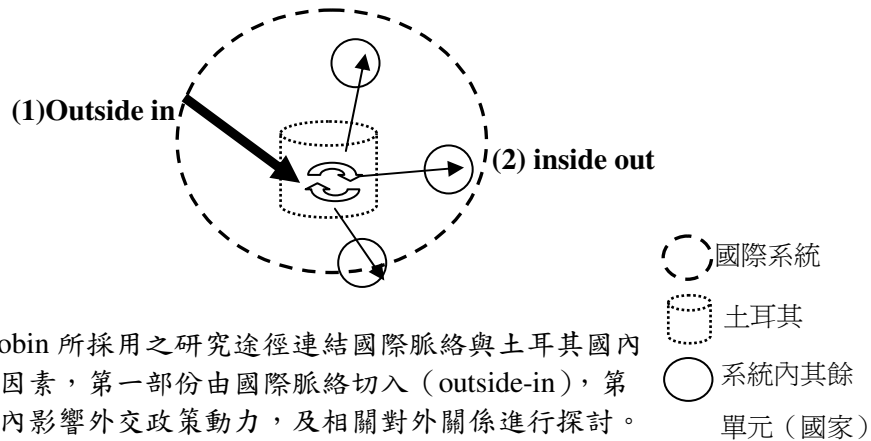
徑 (a three-part approach)。第一部份主要探討土耳其外交政策之整體脈絡，包含外部因素（國際系統主要議程之轉變）及內部因素（國內影響外交決策之行為者立場）之分析。³ 結合國際系統與國內制度脈絡與土耳其外交政策之連結，並進行整體脈絡之探討；在第二部分中，Robin 聚焦於土耳其外交政策在後冷戰轉變時期中物質與概念構成（意即與意識型態及認同相關部分）之因素，包含歷史、意識型態、安全與經濟四個國內層面與土耳其外交政策之連結。Robin 在第二部分中除了歷史與土耳其外交政策之聯繫內探討與重要區域及強權間關係，涵蓋與阿拉伯世界、西歐、希臘/賽普勒斯問題及土耳其與美國間之外交政策歷史聯繫外，主要探討土耳其外交政策內部之動力，由凱末爾典範（Kemalist paradigm）、伊斯蘭修正主義（Islamist revisionism）等意識型態及庫德族議題（Kurdish Workers Party or Partiya Karkaren Kurdistan, PKK）乃至能源議題與外交政策之連結，為避免過於強調土耳其內政之探討，Robin 亦就土耳其內在因素與對外關係之連結（與國內政策相關之外交關係）進行豐富之案例探討。最後第三部分中，Robin 則挑選了四個案例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之實踐：依序為土耳其與以色列、中亞、伊拉克北部（以庫德

族議題為焦點）及土耳其與波士尼亞危機之聯繫，藉此對土耳其外交政策進行更細緻之探討。

綜觀此書，我們可以發現本書主要特色在於其研究途徑與傳統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有些許差異。Robin 嘗試連結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之外在（土耳其與區域間聯繫）及內在因素（土耳其國內意識型態的拉鋸、經濟能源需求分離主義與對外政策產出之聯繫），其研究途徑由國際脈絡至國內影響政策之動力（outside-in 途徑），再由國內政策影響動力探討相關之外交關係脈絡（inside-out 途徑）。（相關研究途徑請見圖二）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土耳其外交政策制訂及其外部關係一個全面性及整體性之觀點立場。

而 Robin 除了提供一套清楚的研究架構外，在資料來源方面採用近期資源並包含豐富文獻、訪談亦為本書特色。Robin 採用較近期之外交案例及發展，希望藉此反應目前土耳其對外關係之特質，且由於本書為作者近十年來之研究成果，故蘊含豐富之參考資源與文獻（英文、法文及土耳其文文獻），並包含約 25 次之訪談內容，更提供本書一個全面性之觀點。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清楚瞭解作者致力採取一個整體性之研究途徑，將傳統影響土耳其外交系絡之外部因素（區

³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圖二、 Philip Robin 之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域關係聯繫) 以及同樣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產出的內部因素 (國內層次相關議題) 皆納入考量，藉此提供讀者一個最完整且豐富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內涵。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實際上土耳其面臨的區域動態脈絡相當繁複，除了與西方主要權力、體制間 (美國、歐盟與北約) 的聯繫外，其周邊區域大多為政治情勢不穩 (中東、巴爾幹區域) 或牽涉至能源利益 (中亞、外高加索區域)，除此以外，作者並連結土耳其國內意識型態的拉鋸、庫德族問題與外交關係之聯繫。因而論者認為針對土耳其相關政治與區域動態並不熟稔之讀者而言，較無法清楚容易地認知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之主要因素為何。換言之，論者認為由於作者強調土耳其外交政策之豐富性，使本書內涵稍嫌繁複，缺乏簡約性 (意即僅探討影響外交政策之關鍵因素的本質)。²

² 實際上，由於作者採用之研究途徑重視影響外交政策之「整體性」，當重視內容豐富的同

在關注領域方面，Robin 認為有關土耳其與歐盟、希臘及賽普勒斯議題已有豐富之文獻探討，因此作者僅將土歐、土希關係與賽島問題置於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與歷史章節中敘述，而非另闢一章進行完整探討。作者認為並未以大篇幅論述土歐關係、土希關係以及賽島問題並非意味對此議題的忽略，而是強調其對於國際脈絡、歷史、意識型態及經濟等因素之重視。不過論者認為土耳其的歐洲願景與歐盟間的聯繫為影響該國外交政策取向的關鍵因素之一，而土-希關係、賽島議題則影響土歐關係的發展與東南歐區域安全之穩定情勢，因而缺乏土歐關係的重點探討實為一大缺憾。

鑑於此，在此可以提供一些相關文獻佐以延伸閱讀，譬如 Tareq Y.

時，即可能犧牲其「簡約性」，也就是清楚明瞭的提出主要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之關鍵因素，如西化傾向或是國際脈絡之影響。因此雖然作者提供一個很完整的分析架構與豐富內涵分析，論者較建議針對土耳其外交關係有基礎瞭解之讀者進行閱讀。

Ismael and Mustafa Aydin 所編著之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及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dism 所編之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等書，³雖然未如 Robin 著作之論述架構完整，然而這些延伸閱讀物著重於土耳其與西方之聯繫中包含土耳其-美國、土耳其-歐盟及歐洲安全架構分析以及土耳其與希臘、賽普勒斯議題，或將能就各個主題提供學理與實務上的完整知識給欲深入研究的讀者參考。

³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dism (ed.),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4); Tareq Y. Ismael and Mustafa Aydi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Aldershot: Ashgate).

Richard Ha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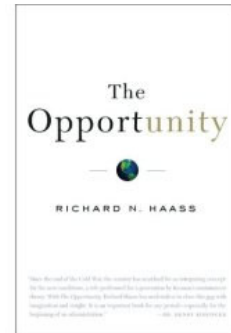
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Moment to Alter History's Course

簡嘉宏 / 遠景基金會國際事務專案執行秘書

一、前言

冷戰結束致使國際政治二元對抗體系瓦解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國。許多觀察家提出「一超多強」的世界秩序結構，美國「世界警察」角色的扮演也愈形吃重。舉凡穩定世界經濟秩序、維持國際政治均勢、進行美國娛樂文化的對外輸出等等，都可印證美國的影響力。在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襲擊夏威夷的珍珠港後，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受到國外勢力的攻擊，這也讓布希政府開始將其新保守主義的理念付諸於軍事行動。在接連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之後，美國以「反恐」為藉口採取單邊行動的正當性已開始遭到法、德為首等國家的質疑。而在伊拉克境內沒有發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事實，更讓美國無法應付來自於國際上的嚴厲批評。

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畫處長的哈斯¹ (Richard Haass) 在2005年出版了《良機：美國改變歷史的時刻 (*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Moment to Alter History's Course*)》一書，書中對於目前美國外交與軍事所面臨的難題提出針砭與建議。本書列舉出美國在21世紀將會面臨的潛在威脅，並提醒美國政府



書名：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Moment to Alter History's
Course

作者：Richard N. Haass

出版者：Public Affairs

出版地：New York: U.S.A

出版日期：2005

頁數：242 pages

ISBN: 15864827

* 本文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之建議，對於本文不足之處予以修正，作者藉此隅表達深深的謝意。

¹ 現為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主席。

要讓歷史發展方向符合美國利益，就必須抓住解決這些潛在威脅的機會。本書共分八章，除第一章解釋美國為何必須把握這些解決問題機會與第八章總結之外，作者還分別論述了主權概念、恐怖主義、核武管制、經濟整合、與其他大國關係以及伊拉克帶給美國的教訓，是一本美國卸任官員以其經驗對美國未來外交行為提出建言的專書。

二、本書論點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美國在二次戰後的許多成功外交作為乃因抓住了契機，使得美國得以一次又一次地渡過難關。在二元對抗的國際環境之下，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以及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一同擘畫了美國的外交藍圖，其中包括：確認圍堵政策(containment)的實行、設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籌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創設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提出核武嚇阻政策、健全美國國安系統與情報組織等等；然而，美國在當時仍無法獨力完成上述政策，因此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與協助。哈斯認為，杜魯門政府在認清時機與審時度勢後所做出的可行與正確的決策，使得美國得以領導世界達60年之久。本書旨在強調美國應該在審慎評估之後，迅速確立美國在21世紀的主要外交思維與行動，不論是經濟

整合、全球參與國際議題、反恐行動的合作等方面，美國都需要儘早擬定一套方針，並與其他各國尋求合作，以形塑美國心目中的世界秩序。

其次，哈斯提出「國家主權並非至高無上」的論點，並以非洲國家蘇丹(Sudan)的達爾富爾(Darfur)種族屠殺為例。若以國家主權不可侵犯性而言，蘇丹境內所發生的任何事都屬蘇丹總統的管轄權責；但若以人道觀點視之，為了延續生命與和平，實則干預是必要的。不過哈斯也表示，與其由西方國家組成若干觀察團對於蘇丹進行干涉，不如由「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介入還來得更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因為西方勢力在歐美以外的地區容易喚醒當地人民心中「侵略殖民」的惡夢，更容易激化民族對抗的仇視心理。所以，哈斯認為美國在處理地區性危機時必須善用區域性組織，同時若在秩序惡化情況下非得干涉的話，必須相當謹慎地拿捏「干涉」的原則，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紛爭與困擾。

接著，在對恐怖主義的論述中，哈斯直截了當地表示美國必須承擔起這個責任。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明確地告訴世界「任何有目的屠殺無辜人民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p.53)。對於2002年的阿富汗神學士(Taliban)政權而言，雖然它不是一個恐怖組織，但是布希政府卻沒有讓世界充分瞭解，美國之所以要攻打阿富汗是因為該政權允許基地(al Qaeda)組織在阿富汗境內藏匿與活動，為了有助於根除基地組織，美國才必須讓神學

士政權垮台。少了這層清楚說明，布希政府的行動反而讓外界對於美國的行動產生疑慮。哈斯認為，儘管「恐怖主義」的界定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定論，甚至在西方國家眼中的恐怖份子很可能被別國視為自由鬥士，但是有一個原則是確立的，那就是「就算其背後動機如何具有正當性，傷害非戰鬥人員就是違反普世價值」(p.56)。但是美國當初錯過宣傳這個信念的機會，反而造成對美國行動的反宣傳，並讓美國的外交至今愈顯施展不開。

哈斯也不諱言現今國際社會反恐作為的確存在著其困難度，其因如下：(一)無法掌握恐怖份子數目，(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容易取得，(三)現代文明社會具有易遭攻擊的脆弱性。雪上加霜的是，恐怖份子中有相當大的比例並不是憎恨美國，而是憎恨美國的政策，其中尤以美國的中東政策最受非議。哈斯認為，要協助巴勒斯坦建國，美國必須與歐盟、日本、俄羅斯、聯合國以及阿拉伯國家合作，才能填補以色列撤離後的安全真空。同時哈斯也認為，美國意欲在中東國家進行的「改革」，必須是與這些改革受體一起努力(*do with them*)，而不是將「改革」的理念與作法強加在他們身上(*do to them*)，諸如女性受教權、經濟改革引領政治改革、政府內權力制衡的建立等等，美國必須協助這些當地政府，而不是在軍事強行佔領後，讓阿拉伯社會質疑這些改革的必要性。

在核武管制部分，哈斯以前蘇聯

為例，說明與其希望改變政權還不如以談判的方式來慢慢影響對手，也許所花的時間與努力很多，但是改變政權的難度其實更大。當時的蘇聯雖然是軍事與政治強國，但是在實行計畫經濟的前提下，蘇聯的經濟基礎相對顯得脆弱；同時，蘇聯與美國的武器競賽也帶給了蘇聯沈重的壓力，最後「蘇維埃主義共和國聯邦」解體，冷戰結束。雖然武器競賽帶來的經濟壓力並非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是哈斯認為這種「政權進化」(*regime evolution*)或「國內引爆」(*domestic implosion*)的方式比起美國企圖改變原政權的軍事方式，對區域秩序的衝擊較小。北韓與伊朗即目前兩個最可能運用的國家，白宮主人是否願意嘗試，存乎一心。

在「經濟整合」部分，哈斯認為國家間的貿易往來越頻繁，彼此間發生衝突的機率就越小。而且哈斯強調，兩國間的經貿互動對於促進彼此關係的效果，比某國對另一國的援助還要來得立竿見影。多邊或雙邊的貿易可以刺激各國技術的交流，但資金的挹注就只能對被援助國的國內經濟狀況暫時杼困而已。況且，美國對外援助常常因為援助性質為救災應變或援助對象具有戰略意涵，反倒使得真正需要援助的貧窮國家苦無資金，任憑經濟情況惡化，而造成美國對外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如前文所述，美國在二次戰後已經逐漸地建立起全球經濟整合的機制(WTO)，提供全球經濟一個解決經濟歧異的對話平台，對形

塑現今的自由市場居功闕偉，但哈斯要提醒白宮領導人的是：在全球整合的風潮下，美國維持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在於提升美國市場就業人口的素質，亦即強化美國的教育；其次，對於能源的過度依賴是美國的「阿奇里斯腱(Achilles heel)」²，同時美國政府開發替代性能源的進度緩不濟急（照哈斯的說法是「誘因不足」(p.134)），而美國規劃分散供應源的構想成效也不大，加上全球能源的有限性，哈斯認為美國必須有效率地使用現有能源，例如：提高燃料稅、鼓勵油電混合動力(hybrid)車輛的使用等等，才能讓美國擺脫對能源的過度依賴。最後，美國必須強化本身的經濟實力以降低全球化帶給美國的損害，並和其他國家緊密合作以避免被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反噬。

就「與其他大國關係」部份，冷戰結束後，各國間由於缺乏共同對抗蘇聯威脅的信念，反而使得跨大西洋的盟國關係並不若過去那般緊密，哈斯指出唯有美國與歐盟國家維持緊密的合作與取得共識，並同時與印度、日本、俄羅斯與中國保持良好雙邊關係，美國才能繼續有效確保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利益。至於在伊拉克的情勢方面，哈斯則呼籲美國國防部要瞭解到「創造和平 (peacemaking)的軍隊」比「維持和平 (peacekeeping)的軍

隊」更為重要，也一針見血地點出美國軍隊至今在伊拉克所面臨的困境。如何在軍事行動之後創造出一個和平的新局面，成為了美國軍隊在 21 世紀所必須學習的課題。

綜上所述，本書認為美國應該把握下列趨勢：一、國際事務區域化，二、美國肩負反恐責任，三、不強加「改革」理念於其他國家，四、有耐性地改變政權終究收效，五、修正現行美國能源政策，六、與其他國家維持良好且緊密的合作關係，七、學習如何創造和平局勢的軍事課題。

三、評論

美國學界對於美國未獲聯合國授權而決定出兵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之討論亦不乏其人。其中，現任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院長的奈伊³ (Joseph Nye, Jr.)於 2004 年所著《軟權力：在世界政治裡成功的方法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最常被引用與討論。奈伊對於布希政府強硬的軍事干預行動深深不以為然，並大聲疾呼美國文化、政治價值以及外交政策才是美國形塑一個有利反恐環境與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世界局勢的利器。奈伊論點中肯，與其過去一向強調國際互賴、捨棄過分著重軍事政治高層次議題的研究有一致性，但奈伊對於現任布希政府從事外交與軍事行為所抱持的負面評價，卻與書中「軟權力與硬權力乃影響他國

²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6 年的國情咨文 (State of Union Address) 中，亦表達相同看法，詳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06/>。

³ 奈伊曾在柯林頓政府內擔任國防部助理部長，以及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

行為一體之兩面」⁴的主要訴求有相互矛盾之虞。

同樣是卸任官員的著作，也都對於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提出看法並論述，但《良機》與《軟權力》不同的地方在於：後者以一套有系統的架構，對於軟權力做完整的論述；而前者只單純列舉出美國可能面對的潛在威脅進行論述，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言。持平而論，哈斯的著作較奈伊來的實際。其因如下：第一，與其如奈伊反覆強調軟權力，倒不若哈斯將全球反恐、經濟整合、核武管制等棘手議題明確化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言來的實際。如此一來，讀者可以清楚瞭解美國外交的困境，並與作者一起思考可能的解決之道。其次，兩本著作都以維護美國領導地位為出發點，進而闡述如何維持領先的方法。奈伊以較為學術的方式來對於軟權力的來源以及運用進行系統論述；哈斯則以目前的國際現勢為例，直指美國外交作為的應然，就拓展讀者群與發揮影響力而言，哈斯的努力較有成效。最後，奈伊書中所列舉的軟權力並非美國所獨有，其他國家在軍事條件成熟之後亦可如此發揮影響力；哈斯則針對美國在21世紀可能面臨之難題一一量身訂做解決之道，在某個層面來說，也繼續引導美國保持現今在國際舞台上的領導地位，相形之下，哈斯較是從維護美國利益發端而著書的。

⁴ Joseph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7.

本書作者哈斯在離開公職之前，長時間任職於美國國務院並成為美國歷屆總統⁵處理許多棘手外交事務的顧問，親身經歷的外交公職經驗讓他在思考美國外交相關事務時能夠跳脫一般學界理想化的思維、實事求是，在考慮許多現實面難題之後，再予以提出看法企盼能對症下藥。不過，哈斯是在離開公職後才開始此書的撰寫工作⁶，在擔任國務院政策計畫處長時因為職務權力的限制，可能比較無法對美國外交政策作一全盤縝密之規劃，現以智庫學人身份著書立言，該書言簡意賅，內容立意深切，也算是稍稍彌補了當初的缺憾，而且作者在本書中所論述之議題，的確是美國在21世紀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作者在官僚體系中所受的訓練加上其獨特的觀察方法，讓這本書所帶來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然而，哈斯在本書中較著重於政治、軍事、經濟層面的討論，對於美國所面臨的文化、科技、環境、人口、毒品走私、社會福利等議題似乎完全略過，並讓讀者誤以為只要政治與軍事問題獲致解決，其他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算是本書的一個瑕疵。而上述奈伊的「軟權力」論述恰巧可以對於哈斯缺乏的觀點予以充實。

⁵ 在卡特政府時期，哈斯任職於國防部；在雷根政府時期，哈斯任職於國務院；2001年之後成為美國總統布希在處理阿富汗、北愛以及中東事務的代表與顧問。

⁶ 哈斯在書中前言寫道：「這本書初稿完成在2004年的11月1日，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的前一天，我的用意是不論布希第二任期或凱瑞（John Kerry）新政府都可以參考」。

本書的英文書名原文為：「*opportunity*」，封面上以斜體的方式突顯出「*unity*」，與作者在書中一再闡述「整合」概念相互呼應。哈斯在總結時闡明「只有美國領導才足以說服其他國家，並與美國共同建立一個能夠應付對和平與繁榮的挑戰的整合世界」(p.198)，一針見血地把美國先前因進行單邊行動產生負面效應後所面臨的困境提點出來，並藉由對「整合」概念的論述以期能彌補冷戰時期「圍堵政策」之後所遺留下來的美國外交戰略思想空缺。證諸布希政府第二任期內逐漸開始與歐盟、中國、俄羅斯等國在國際議題上的合作與討論，在哈斯眼中，美國似又抓住了在 21 世紀得以繼續領導世界的契機。

伊多·奧倫(Ido Oren)

著 唐小松、王義桅譯

美國和美國的敵人：

美國的對手和美國政治學的形成

郭銘傑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Oren 在本書以知識社會學的方式，透過梳理美國和美國敵人的關係來反映美國政治學這個學科的形成。這裡，Oren 將美國與敵人互動產生的自我身份作為一個解釋美國政治學形成的變量，同時這個變量鑲嵌於美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p.24)。透過對二戰前後美國政治學知識脈絡的抽絲剝繭，Oren 認為他找到了美國政治學並非客觀中立，甚至作為一套意識型態的種種證據。這些證據來自於美國政治學界在戰前戰後看待日本（導論）、德意志帝國（第一章）、納粹德國（第二章）和斯大林蘇聯（第三章）敵友關係的轉變。一旦昔日的親密戰友變成今日的主要對手，一旦過去的頭號大敵成為現在的堅實盟友，Oren 認為：美國的自我身份就可以從與他者（other）關係的比較中突顯「美國」或是「我們」的意義，座落於歷史脈絡中的自我身份也不再空洞(p.20)。

透過與敵人關係的比較，Oren 得到三種在歷史中不知不覺被意識型態化的美國政治學身份意識。一種是「抵制派」（oppositional）；另一是「妥協主義者」（accommodationist）；最後則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抵制派」認為：美國體制上是殘缺不健全的，應該向世界學習；「妥協主義者」主張：美國應該向選擇性地適度向世界學習；「民族主義者」則認為：美國不但幾乎沒有需要向世界學習的地方，世界甚至要反過來學習美國(p.21)。然



書名：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

對手和美國政治學的形成

作者：伊多·奧倫(Ido Oren)

譯者：唐小松、王義桅

出版者：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2004

頁數：290 頁

ISBN：7208052751

而，「抵制派」的激進取向，使得他們未曾主導美國政治學。因此，在大多數時期，美國政治學社群主要還是不斷在「民族主義」與「妥協主義」之間競逐、擺盪(p.22)。例如一次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使得政治學者指望納粹德國和蘇聯能為美國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或進行社會主義式計劃經濟提供典範，「妥協主義者」暫居上風。然而，隨著美國與德國在二次大戰的正面碰撞以及美國與蘇聯之間冷戰的開始，冷戰前盛及一時的公共行政學不再被美國政治學的列為五大核心項目之一(p.128)，戰前強調社經地位平等的民主論述也被講究程序的多元主義民主論述替代(p.150)，「民族主義者」執掌了形塑美國政治學的牛耳。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富有效率的德國行政官僚體制背負著納粹德國惡貫滿盈的原罪(p.129)，學習與納粹德國同樣有著極權主義病症(totalitarian syndrome)的蘇聯會讓美國的民主染病(p.146, p.151)。美國政治學對公共行政的忽視(pp.126-29)以及美國式自由主義程序民主美國政治學中獲得勝利(p.184-86)，反映了上述美國政治學身份意識的轉變。

其後，隨著冷戰(第四章)揭開序幕，「妥協主義者」改革美國政府的衝動還是被「民族主義者」改革外國政府的主張所替代(p.205)，並且形塑了美國政治學的新面貌：試圖把敵人變得像自己一樣。例如：配合美國政府改革第三世界國家的行政機關以遏止共產主義的需要，James W. Fesler

把戰後衰頹的公共行政學帶上了比較行政的新路子(pp.200-02, p.209)；Lucian Pye 早先透過中情局與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對馬來西亞共黨的遊擊隊進行心理分析，不但成為美國對亞洲進行心戰諮詢戰(pp.226-27)，他與政府的密切關係更讓一九五六年成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的國際安全研究以其他的同事獲得政府大量的研究資助(p.229)。此外，Bruce Russett，當前美國「推廣民主」戰略理論依據的「民主和平論」的創始者之一，其大規模的國際關係定量分析數據實來自六〇、七〇年代軍工複合體下的美國國防研究計劃(p.203)。

Oren 對於上述這種冷戰下的美國政治學嗤之以鼻。他認為只要能透過大量史料證明冷戰政治中政治學研究者與政治的關係就可以對其龐大學術成果的客觀性加以質疑。他寫道：「如果我們發現某個醫學研究人員與他的病人關係親密，我們常常懷疑他的知識水平。同樣，是不是如果學者自身介入—哪怕是部份介入—康涅迪格的城市政治，我們就不懷疑他這方面的知識水平了？是不是如果一個人在美國駐莫斯科使館供職五年之久我們就不懷疑它關於蘇聯的知識了？(p. 204)」在此邏輯下，Gabriel A. Almond 與 Sidney Verba 的 *The Civic Culture* 這本聲稱英美公民文化是世界其他國家典範的比較政治研究的經典受到了 Oren 嚴厲的批判。他指出 *The Civic Culture* 不單是政治文化或比較政治研究的教科書或經典，更代表美國政治學中民

族主義者的學科身份認同，美國以外的讀者不得不警覺這是一本改造本地文化的美國國家安全著作(p.213)。

藉由處理戰前戰後美國政治學身份意識的轉變，Oren 這部作品一方面鉅細彌遺地梳理了美國政治學學科發展史，另一方面也挑戰了美國政治學研究中主客體相互分離的假設 (p.281)。因而他批評「民主和平論」不能省略這裡的「民主」是戰後「美國的」民主這一事實，以及這種「民主」將美國與敵人的差異留傳下來而將相似略去不談(p.283)。不過，Oren 並沒有完全放棄知識客觀性的可能性。他所謂政治學「以一種彈性的方式去處理客觀性問題」(p.286)正承認了政治學知識脈絡變遷的客觀性。這種承認政治學知識脈絡變遷客觀性的「新認識論方法」(p.285)看起來複雜難解，不過其實也就只是意味著：只要 Oren 分析的是自己過去未涉入其中的某種歷史，那 Oren 就可以暫時免除自己成為其他研究者把 Oren 放到此一客觀歷史脈進行研究時，被其他研究者批評 Oren 犯了自己批評美國政治學研究主客體不分的錯誤。

Oren 此一新認識論其實就是科學實存論的一種變異。預設研究者可以對特定時期的歷史進行客觀研究，並且保留研究者退出後歷史辯證演的可能以供後人進行客觀研究的基礎。這種新認識論的缺點在於：如果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以「徒勞無功」來批評 Oren 論證美國政治學研究並非客觀中立的方式時，Oren 勢必得坦率接受自

己大費周章地搜集史料「只是」證明一個後現代主義者早已廣為接受的知識論主張。另一方面，如果主張客觀政治學知識論的政治科學家批評 Oren 在「接受政府資助」與「作出不客觀的研究」上預設了太強的因果推論關係時，Oren 也不得不承認存在著這麼一個可能情形：接受候選人買票的選民不但不把票投給行賄的候選人，反而還根據一份有著客觀指標對候選人進行評估的報告去把票投給評鑑最好的候選人。換言之，本書這種「新認識論」的論證方法與推論前提並沒有讓本書在批判客觀認識論時免於後現代主義者與實證主義者的兩相質疑。

最後，雖然本書主張美國政治學研究並非客觀中立的論證方式仍受可能到來自不同知識論陣營的詰難，不過至少有兩點是確定的：第一、Oren 在本書中豐富的一手資料與二手文獻為美國政治學學科發展史作了重要的紀錄；第二、美國政治學身份意識的轉變影響了整個學科次領域的發展，比較政治與國際安全研究的興盛是最有力的證據。讀者很難不反問：作為美國政治學輸出地之一的台灣，台灣政治學的學科史在那裡？台灣政治學的學科身份認同又在那裡？台灣對美國政治學的學術依附性是不是可以從冷戰期間中國作為台灣和美國共同敵人的歷史脈絡中理出一些頭緒？這些問題有賴台灣政治學界關心學科本身形成與身份認同的先輩與後進共同書寫與紀錄、見證。

Wolfgang Reinicke

Global Public Policy: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施偉仁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科技發展及資訊自由流通推動的全球化下，人民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對國家的治理能力產生挑戰，國內公共政策制定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尤其在經濟、環境等議題上，本書將探討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

全書架構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份即第一章，主要在闡述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互賴在理論上的區別；第二部份包含第二、三章，也是本書作者的論述中心，提出因應經濟全球化下的全球公共政策思維；最後一部分則涵蓋第四、五、六章，Reinicke 提出三個經驗事例來支持他的論述，包括全球銀行及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洗錢管制和軍民兩用科技的管理。

Reinicke 在第一章強烈主張經濟全球化並非全球經濟活動在「量」上面的增加，經濟全球化不等於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市場的產生，相反的全球化產生和以往不同的質變，和經濟全球化一般被視為經濟和金融活動擴張所造成的跨國互賴的現象有所區別，作者主張全球化是個體層次的現象，在社會、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不同領域及國家及國際兩個不同層次同時發生，這個現象即是大量的公司超越國界發展，這象徵著公司策略和組織結構的轉變，全球化對組織內部的結構影響，國際經濟活動雖然會對組織內部產生影響但也反映在跨越疆界的公司活動重組。新型態的公司間及公司內的



書名：Global Public Policy: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

作者：Wolfgang Reinicke

出版者：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出版地：Washington, D.C.

出版日期：1998

頁數：307 pages

ISBN：0815773900

貿易和金融機制已經根本地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本質，個體層次的公司跨國形成總體層次的商業網絡，這些網絡因其所掌握的經濟資源而擁有權力和影響力，這樣的改變使經濟全球化和互賴的差異即在跨國流動的普遍化下民族國家職能的改變（pp.48-49），國家再也無法完全主宰國內的公共政策。

第二章作者主要的論述環繞在現今國際體系下國家主權的意義和在公共政策上的實踐。作者將國家主權區分為外在主權和內在主權，外在主權是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合法化象徵，而內在主權則是國家對內治理的能力，兩者傳統上皆是由空間上的疆界來界定。在經濟全球化下國家的外在主權仍然被國際體系所接受，但內在主權則受到很大的威脅，因為全球化的公司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固定政治疆界，產生了跨越了政治疆界的多重經濟疆界。（pp.64-65）換言之經濟互賴牽涉到的是對國家外在主權的挑戰，但全球化則挑戰了國家的內在主權，由於國家已逐漸無法實踐其內在主權，在政策制訂及執行的過程中尋求外來資源的協助是必須的，全球公共政策需要從國家疆界內的政策制訂中解放出來，由包含國家和非政府行為者的政策過程來完成。

在第三章中，Reinicke 討論傳統上政府對全球化的政策回應有兩種模式：「守勢干預」(defensive intervention) 及「攻勢干預」(offensive intervention)，前者指的是政府「積極

管理」，如對資本流動的管制、以關稅等政策工具創造一些障礙或對國內的公司加以補助；後者指的是政府為增加國家的競爭力「解除管制」，如降低關稅或資本流動自由化。然而因為全球化是將私部門的經濟活動從民族國家的疆界中區分出來，以上兩種傳統的保護主義途徑將會使國家的經濟狀況更糟，Reinicke 所要表達的是一旦國家的內部主權遭遇全球化而弱化，將無法顧及公共利益及提供公共財，如此不只會造成國內的問題，也會連帶影響國際上其他國家，解決之道是各國突破傳統現實主義式的外在主權局限，在各種議題上進行合作，形成「全球公共政策」，換言之，內在主權的管理要以全球化擴展下的功能或部門為基礎，而非傳統國家疆界。（p.85）

在全球公共政策的實踐上，Reinicke 主張在決策上應有輔助原則（subsidiarity）的適用，Reinicke 將輔助原則分為垂直和水平兩個面向，垂直的輔助原則指的是不同層級決策的授權，水平的輔助原則指的是「非政府行為者」的參與。全球公共政策指的是政府和非政府行為者協力合作的深化和廣化，其結果就是跨國公共政策在功能上的整合。

從第四章到第六章作者從銀行金融市場的全球監理、洗錢管制和軍民兩用科技的管理等三個經驗事例詳細描述了全球公共政策的政策網絡，包含私部門、政府制度和國際組織，Reinicke 藉以上三個例子表達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協力合作並將

政策的執行面外包，Reinicke 將公共政策定義為：「政府在建構和執行意義上操作內在主權的主要工具。」(p.54)，因此可以說在全球公共政策的實踐上，政府釋出部分的內部主權換取國內合法性的增強。(p.133)

從 Reinicke 所提出的經驗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似乎認為參與者彈性化的「治理網絡」是全球化 and 全球公共政策的唯一解決方案，而「治理網絡」本身的成功仰賴彈性及包容性的提升。(p.226) 然而，Reinicke 並未提出如何擴展彈性及包容性的實際作法，本文擬從以下兩個面向加以評析：公共政策的政策形成、政策執行和政策評估三大階段及國際關係的理論面。

在公共政策面向起點的政策形成階段，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全球公共利益如何界定？誰決定非政府行為者可以參與全球公共政策的決策？Reinicke 的觀點偏向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國家利益會經由國際社會中的競爭機制自動調和，(pp.73-74) 但其他學派卻不這麼樂觀。其次，在政策執行階段，Reinicke 偏重行政的面向而忽略了政治問題，連結全球公共政策中不同的行為者將會是艱鉅的挑戰，不同利益的非政府行為者如何協力合作？尤其授權非政府行為者所衍生出的該行為者是否具代表性問題，國際非政府行為者參與全球公共政策將可能產生「民主赤字」，另外如何處理無法參與其中的行為者也是一大問題。最後，在政策評估階段，授權非政府行

為者將會衍生出的監督問題，由於政策結果最後可能還是由政府負責，所以政府需要建立一套監督機制；另一方面全球化將會造成國內及國際間的貧富不均，但作者對公共政策的再分配功能略而不提，十分可惜。

另一方面，從國際關係的觀點來說，Reinicke 在將內在主權和外在主權做了理論上的區分後，作者認為位居國際關係理論主流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討論的國際結構都限制在外在主權的範圍內，因此國際事務的決策是一種由上而下 (top-down) 的過程；然而經濟全球化雖然對國家的外在主權影響不大，卻會挑戰國家的內在主權，其決策模式為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過程，因此在 Reinicke 看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有其先天上限制，皆無法處理全球化的挑戰。但反過來說，Reinicke 太過重視由個體層次投射到總體層次的決策現象，卻也忽略了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所重視的「權力」問題，事實上，國際權力結構仍然主導政府行為，例如書中所舉管理銀行資本流動的巴賽爾協議 (Basle Accord)，其實本質上是由美國運用其國際經濟實力所主導。如何調節全球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有待學者進一步解答。

雖然 Reinicke 的《Global Public Policy》無法為所有的國際或國內公共問題提出解答，但此書卻不失為拋磚引玉之佳作。

杭廷頓，柏格/編

王柏鴻譯

杭廷頓 & 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

謝叔芳 /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一、前言

全球化理論多以華勒斯坦 (I.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論」為先驅，而賀德 (David Held) 則在其所主編的《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一書中將全球化理論歸納為超全球主義論 (hyperglobalist)、懷疑論 (skeptics)、及轉型主義論 (transformationalist)。其中懷疑論以及超全球主義論認為全球化屬於某種經濟或文化密集聯繫的單一過程¹，轉化論者則認為全球化是某種存在於所有主要社會活動領域的高度差異化過程，很難釐清為某種純粹的經濟或文化現象。

《杭廷頓 & 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Many Globalizations) 是一本集體學術分工的作品，希望超越過往全球化理論正負兩極看法之困境，以十個國家的文化全球化個案為主要內容，呈現各個國家社會經驗的多樣性，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應該一併的理解，呈現「零碎而多元趨勢的全球化」。

二、內容介紹

《杭廷頓 & 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是以柏格 (Peter L. Berger) 1997 年在《國家利益》雜誌 (National



書名：杭廷頓 & 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

作者：杭廷頓，柏格編

譯者：王柏鴻

出版者：時報出版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2

頁數：327 頁

ISBN：9571338044

¹ 超全球主義論者對全球化持肯定與贊同的態度，認為國家的權威即將衰落，世界將再全球資本主義與科技的驅動下形成全球戰場。懷疑論者則對全球化持不信任和貶抑的態度，認為現今國家不僅沒有滅亡，而且其權力、重要性更加重要，全球化不過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間的「國際化」。詳參閱：David Held 等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台北：韋伯，2001)。

Interest)所發表的「全球化的四個面向」為統一指導原則，集合十國學者，包含台灣、中國、日本、印度、德國、匈牙利、南非、智利、土耳其和美國，探討全球化在這些國家中的情形，以國際企業、跨國通俗文化、世界學術菁英、環球通俗宗教的四個面向來看各國文化全球化現象。柏格 (Peter Berger) 並且列出四種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互動的可能結果，包含「取代」、「共存」、「融合」、「排斥」等不一的程度，以便分析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之互動。

本書有十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與另類現代化」是台灣、中國、日本以及印度的全球化經驗，以作者的分析架構觀之，此四個國家的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² 互動呈現共存與融合。首先在國際企業菁英面向，企業家雖熱情擁抱西方價值，但仍保有原來的管理文化，例如：台灣企業家仍習於透過「關係」和「信用」拓展業務 (p.42)。日本大型企業沒有因為全球化而放棄長期雇用和年資升級制，僅對其作修正 (p.86-107)。其次在通俗文化方面，西方速食業的引進並未全然使日本和印度的飲食文化全然改變，卻是引進標準化的管理文化。學術菁英則認為不可忽視西方思潮對於全球化的影響，唯在中國，權威當局對既有意識形態維護之

下，新左派和自由派對此而有激烈辯論。最後在宗教面向則較為不同，台灣、日本及印度都是趨向多元化的，台灣較有代表性的則是「佛教復振」，如慈濟等宗教團體；中國則不容許社會出現獨立有組織力量。

第二部分則是以德國和匈牙利為同一群組所做的「全球化與區域次級全球化」分析，主要是從冷戰結束以後來看全球化在此二國家的發展，依 Berger 之架構，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此二國應是並存且有排斥意圖的。學習英語對於企業菁英來說是一種不得不的現實。通俗文化方面則必須承認美國文化的勝利，也因此學術菁英以「可口可樂殖民」和「瑪麗蓮夢露主義」批判之 (p.169)。若以區域的概念來觀察以此二國為代表的東歐地區，可發現其矛盾心理：美國式文化作為主要外來文化早已是現實，然而德國也希望建立「歐洲文化」以抵制美國的霸權 (p.157)。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邊陲效應」，以南非、智利和土耳其等一般認為在全球化歷程中經濟力量處於邊陲的國家為代表。全球文化和南非、智利本土文化是融合的，在過去殖民母國的影響下，南非的企業及學術菁英可以憑著英語的優勢，在非洲扮演一重要的角色，然而非洲文藝復興將何去何從卻也是其將面臨的一重大課題 (p.218)。其次在智利沒有出現本土的反全球化力量，主要原因是智利在過去被殖民的歷程中早已經歷了宗教給予的全球化洗禮，保守的天主教與新

² 全球文化在此並非一單一文化，指的是某一國在開放的全球體系中所面臨的外來文化，例如：中國在通俗文化面向除了受好萊塢電影影響，亦受台灣影視影響甚鉅。

教本身就是全球化 (p.274)。最後在土耳其則看到了較為不一樣的全球化願景，土耳其社會希望能建立以「回教人」為基礎的土耳其未來 (p.289)，全球化對於土耳其而言是回教理論超越國界運作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土耳其所表現出來的是超越「排斥」而更積極的「伊斯蘭全球化」願景。

最後，第四部份為「美國漩渦」，美國企業菁英自認為是「世界公民」，表現出的世界主義並沒有離開過「家鄉」。美國之所以被視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原因在於科技和全球企業大部分來自美國。其本土性在全球化中並沒有被摧毀，而是轉為抽象流動和臨時的現實狀況，但是也因此美國的世界主義在某些方面也是封閉和偏狹的 (p.321-327)。

綜觀本書，柏格 (Peter Berger) 從全球化四面向在個案中的經驗來分析，可以發現作者的全球化概念雖是以美國文化最為主要的強勢文化，但是在十個國家中，四個主要分析面向的所呈現的「全球化」不以美國為主要外來文化，尚且包含區域性的次級文化流動，也正是作者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不只一條現代化道路」。

三、評論

本書是主要著墨在全球化的文化面向，認為全球化包括學術精英作為全球化急先鋒，及此一潮流下通俗文化帶來的重大文化革命，看精英文化及通俗文化的摩擦與融合，看不同文化運用新適應能力來對全球化反應。若依本書的個案分析，文化全球化不

同於政治經濟面向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只一條現代化道路，亦可能會出現如歐洲化的「次全球化」，或是如土耳其的「伊斯蘭世界化」願景。就此而言，本書提供吾人對於全球化轉型論內涵進一步思考，文化面向的全球化分析是零碎而多元的，並非只有單一文化價值主導，也因此本書的英文書名為 *Many Globalizations*。

其次，讀者將能從本書中看到編者對於全球化理論的用心，以十個代表國家為經，全球化的四面向為緯，加以對於不同的全球性文化和本土文化互動的分析，增加了原有全球化理論的縱深，也使得全球化分析論述更加生動豐富。唯本書較為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雖然本研究在國家選取方面有：四個亞洲、國家三個歐洲國家、一個非洲國家、一個南美國家，及一個北美國家，算是很廣泛的包含了「全球」。但是在亞洲部份過分偏重「東亞國家的全球化角色」，若能加入中東國家的全球化分析，將會讓本書更為周延。此外，學術分工的方式雖幫助此一跨國研究能夠節省成本及時間，但是不同研究者對於變項操作的分析以及概念認知未必能夠達到一致，且本書對於全球化分析僅於現象描述，並未對於 Berger 所提的四個互動現象做歸納及說明，也可能造成本書研究成果的效度問題，值得讀者注意。

最後，本書的重點著重在於全球化的「文化面向」，生動的實證層面的個案分析，提供讀者了解近幾年世界各國經濟頻繁互動之下的文化互動。

唯全球化的理論尚包含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軍事全球化等，筆者建議將本書作為進入全球化理論的入門書，欲進一步探究全球化相關議題，可另則較為深入的書籍補充閱讀。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一般書評：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徵求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長篇書評，內容包含 3 至 6 本相關書籍的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之書評的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五、八、十一月一日以前。

■稿件筆潤：

- (一) 一般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元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學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